

汉初“华夷之辨”与汉朝边疆政策

关连芳 陈东

(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黑龙江齐齐哈尔 161006)

【摘要】 西汉初年,国力衰败,边患频仍,先秦的“夷夏之辨”思想被人们重新提出,成为统治阶层不得不思考的现实问题。一些政论家在不同阶段对此提出了相应的民族政策,以期“以夏变夷”、“纳四夷于华夏”,从而奠定了汉朝民族观和民族政策的基调。尤其是至汉武帝时期,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政治上实现了“大一统”,军事力量亦空前强大,导致民族关系和政策随之也出现了变化。

【关键词】 汉初; 华夷之辨; 边疆政策

DOI: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秦末农民大起义动摇了秦朝的统治基础,同时刘邦赢得了楚汉战争的主动权。汉高祖虽然登上了西汉的皇帝宝座,但迫于实力不济,也无法免于匈奴的羞辱。汉文景时期,匈奴不时就南下对华夏族进行侵扰,成为汉王朝的肘腋之患。汉武帝时,随着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汉朝政府立朝以来的“夷夏并尊”、“夷尊华卑”等观念,重新被人们所不齿,迫切希望改变现状。一些儒学政论家如刘敬、贾谊、董仲舒等人提出了不同的民族政策,主张在政治“大一统”下实现民族上的“华夷一统”。

1、汉初“华夷之辨”

战国和秦末的长期战乱,极大地破坏了其时的社会秩序和民众生计。汉朝建立时,整个社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汉书·食货志》载汉初情形:“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醢,而将相或乘牛车。”民间物价奇高,百业凋敝,民不聊生,整个社会充斥着破败的气息。为了缓解社会危机,巩固新生的汉政权,统治者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汉朝政府自顾不暇,无法顾及边境。

汉政权初立,匈奴不断骚扰汉境。高祖六年,匈奴大军围攻马邑,汉军完全处于被动局面。汉高祖虽亲自带兵反击匈奴,结果被困在白登山达七日之久,最后只能以重金贿赂匈奴阏氏才得以脱身。由于汉朝的进攻未能使汉边形势转危为安,反而让汉室陷入进一步的被动,高祖被迫与匈奴结为昆弟。这样,在汉初夷夏关系就呈现出“夷夏并尊”,甚至是“夷尊夏卑”的倒悬之势。

1.1 刘敬“和亲”思想

刘敬主张通过对匈奴和亲,用耳濡目染的方式改变匈奴落后的文化,使其逐步“华夏化”。他在向高祖提议和亲时曾指出,通过对匈奴岁奉,可以满足匈奴对汉物品的需求,减少匈奴对汉室的侵扰;将汉室公主嫁于匈奴单于,有利于换得边境和平。可谓“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

汉朝与匈奴军事实力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刘敬企图通过和亲政策用华夏文化去改变匈奴风俗,以此令匈奴称臣。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采用此种方式有利于汉王朝趁此机会休养生息,用“以夏变夷”的方式解决朝廷的政治困境,是利用西汉王朝强大政治经济文化优势来同化匈奴的具有进攻性的策略。

1.2 贾谊“三表”、“五辑”之术

为了臣服匈奴,贾谊创造性地提出了“三表”与“五辑”之术。所谓“三表”,即“立信义、爱人之心、好人之技”;所谓“五辑”,即“赐之盛服车乘、盛食珍珠、音乐妇人、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亲近安抚。”

贾谊的“三表”、“五辑”策略,基本上可以说是儒家“以厚德怀四夷”民族思想的具体运用。在其策略影响下,匈奴的经济文化和衣食住行受到汉朝的很大影响,且达到了“好汉增

絮食物”的程度。贾谊试图通过“三表”“五辑”策略,使匈奴“渐染华风”,从而让其达到华夏化的结果,虽未达到预定效果,但是还是对汉匈双方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文景帝时,汉王朝继续采取对匈奴和亲与岁奉政策,仍然试图通过这种渐进式的方法,达到“用夏变夷”。

1.3 董仲舒“纳四夷与华夏”

“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春秋公羊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大一统”一词。董仲舒继承了《春秋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并把这种思想与汉初的华夷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夷夏一体思想。

董仲舒主张统治者要对各民族一视同仁,既要爱诸夏,还要爱四夷。董仲舒建议汉朝统治者对于遵守华夏礼仪文化的夷狄要进行肯定和赞扬,而对于不愿遵守归化华夏礼乐文明的少数民族也要怀有仁爱之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大汉王朝的民族一统。他主张“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尽管他的主张是有层次的、由近及远的爱,但是对四夷仍讲仁爱,这是先秦思想家没有提出过的,是中国古代民族观的一次飞跃。

董仲舒反对通过武力征伐来使四夷来归。他认为《春秋》“无劳民”、“敬贤重民”。因此,凡是苦民、害民的行为,他都予以斥责。他对楚国大夫司马子反“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的行为大加赞赏。同时他对丞相公孙弘征伐四夷的对外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而得到了班固的高度评价:“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

从刘敬、贾谊到董仲舒,他们的民族观念虽说是不同时期的“一家之言”,但对汉朝当时和以后的民族政策仍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2、汉朝的民族政策

中国气候南北不同,东西各异。长城以北为干旱半干旱气候区,干燥少雨,适合草原畜牧业的发展;秦岭淮河以南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湿热多雨,雨热同期,适合开垦和农业种植。由于各少数民族情况各异,故汉朝所采取的措施也有所不同。相对于以农立国的西汉政权来说,匈奴所处的地理环境并不适合农业的发展,属于“蛮荒之地”,因此对匈奴只需要让其保持华夷秩序即可;而南方适合灌溉农业的发展,因此对南方诸越要将其变为华夏之域。

2.1 和亲与安抚

汉朝建立之初,北方匈奴实力强大,朝廷在与匈奴的军事斗争中屡获败绩。为了恢复国力,缓和紧张的边境形势,从汉高祖白登之围至汉武帝初年,汉朝政府主要采取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根据《史记》记载,从高祖至武帝时汉匈的和亲次数达八九次之多。

和亲时间	女方身份	男方身份	和亲出处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	汉宗室女	冒顿单于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汉孝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	汉宗室女	冒顿单于	《汉书·惠帝纪》
汉孝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	汉宗室女	冒顿单于	《史记·匈奴列传》
汉孝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	汉宗室女	老上单于	《史记·匈奴列传》
汉孝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	汉宗室女	老上单于	《史记·匈奴列传》
汉孝文帝后元四年（公元前160年）	汉宗室女	军臣单于	《史记·匈奴列传》
汉孝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	汉宗室女	军臣单于	《史记·匈奴列传》
汉孝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2年）	汉宗室女	军臣单于	《史记·匈奴列传》

对于西汉政权而言，和亲虽然是被迫之举，但是通过和亲，为西汉初年国力的恢复提供了安定的边疆环境。客观上也给匈奴带去了汉朝先进的思想文化，加强了彼此的了解，有利于匈奴“华夏化”。同时通过和亲，匈奴获得了不菲的财物，减少了其对汉朝边境的侵扰，有利于保护汉匈两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为了让南越向汉朝称臣，高祖时就派陆贾作为汉使前往南越，通过各种游说安抚，最终“拜尉他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高后时，南越王日骄，自称南越武帝，反叛朝廷。高后发兵攻打南越，后“士卒大疫……高后崩，乃罢兵”；文帝时，为了改善与南越的关系，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南越“乃顿首谢，愿长为藩臣，奉贡职”，朝廷恢复与南越的关系。

2.2 征伐与经略

文景之时，经过多年的国力恢复，汉朝国力渐强，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在这一时期，尽管汉朝依然实行“和亲”政策，但是匈奴仍不时骚扰汉朝边境，汉初以来和亲的屈辱感在此时慢慢发酵，人民不再满足于现状，汉朝内部普遍产生了征伐和降服匈奴的思想，并在汉武帝时付诸实践。

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汉朝无论是军事

实力还是国力都达到了鼎盛阶段。盛况之下，“京师之钱……太仓之粟……众庶街巷有马……”皆为空前，为汉武帝大展宏图提供了可能。他检讨了传统的黄老无为思想，取而代之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通过对匈奴进行三次大规模的战争，使匈奴再也无力大举南下，解除了匈奴对汉朝北部北疆的威胁。

在北击匈奴的同时，汉武帝对西南夷和东南夷地区也进行了经略。他援助东瓯，平定南越，设立南方九郡。讨伐闽越，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五郡。至此，东南夷和西南夷被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直接垂直于中央管理。

汉初人们提出的民族主张虽有一定的差距，但基本都主张在政治“大一统”下实现民族上的“华夷一统”。从总体上来看，汉初的民族关系和汉朝国力息息相关。伴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汉朝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也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于北方而言，由于汉匈之间势均力敌，汉政权无法短时间内制服匈奴，把匈奴纳入自己统治，因此只能以长城为界限，保持华夷秩序；于南方而言，汉朝通过一系列的征伐，把西南夷和南越诸国逐步纳入了自己的版图，建立诸多郡县，对当地居民进行华夏文化输出，进而直接“汉化”统治。这种“华夏一体、南北各异”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后世汉人王朝政权的统治思想框架。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2] 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3] 何休. 春秋公羊传注疏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4] 李大龙. “用夏变夷”与西汉初期刘敬的“和亲”建议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2000 年第 3 期.
- [5] 刘宝才. 华夷之辨与中华各民族认同互动 [J]. 中国文化报, 2014 年 5 月第 1 期.